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十二期 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

编者的话：文革期间，对于毛泽东、林彪与军队的关系有一种通行的“一贯提法”：毛“亲手缔造”，林“亲自指挥”。

读本文可以发现，这个“一贯提法”可不是随便说说，短短的一句话，在毛泽东有意抬举林彪的背景下提出，再经不断的修改提炼、到最终定型，费时近一年，是领导集体的心血结晶。于是，要不要在这个“一贯提法”中塞进看上去无伤文意的四个字，就成了政治局会议上争论不休的大问题，甚至要惊动远在外地的毛本人。

按照“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提法”的变化往往暗示着“斗争形势的发展”，甚至会牵动社稷安危。四个字的取舍，看似“应景文章”，无关宏旨，实则意味深长，为庐山风云埋下了伏笔。后来在庐山迷雾中转了向的衮衮诸公只能怨自己没有悟出“微言大义”。

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先是党中央、后是全国人民跟着伟大舵手急转弯。照例，一部分人被抛下“革命航船”陷于没顶之灾；更多的人身子转了，脑筋却转不过来，全国思想大乱，文革败相已露端倪。

其实说穿了，“缔造”和“指挥”的风波的要害无非是：军队到底听谁的？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当然要防范军权的旁落，既“缔造”之，自然“指挥”之，名正言顺；熟谙党内斗争的林彪对“副统帅”的地位本就深自忧惧，他既不能、也不敢、甚至不想“指挥”，避之唯恐不及，但“是祸躲不过”，最终还是难逃一劫。

古人云，兵者凶也。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国家政治生活自有其运作程序，既不可能动用军队干预，竞争各方也决不担心失败后有身家性命之忧；而在专制体制下，军权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资本，不仅是领导权、发言权，而且关乎领导者本人的自由权乃至生命权。失势者固然朝不保夕，得势者又何尝有一日安宁？明乎此，当不难理解毛、林、周诸位的处境。

阎长贵先生的文章小中见大，勾勒出现代中国政治形态之一斑。

“缔造”和“指挥”的风波

阎长贵

政治局会议上的争论

1970年，“两报一刊”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四十三周年所写的社论，题目叫做《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其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为：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走过了四十三年英勇战斗的历程。

周恩来在1970年7月25日、27日连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篇社论，会上对这句话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陈伯达主张改回到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即将“直接指挥”前面的“毛主席和”四字去掉。张春桥坚决主张不改。康生认为新提法不易译成外文。周恩来觉得此事重大，需要毛主席本人定夺。

7月28日，周恩来将“八一”社论稿送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审定，同时附信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汪东兴回忆说，我把总理的信给毛主席念了，他要我代他画圈后退回去。我觉得难办，所以我没有圈回去，把信带在身边。毛主席、周总理在上海接见外宾后，周总理、黄永胜都问我那个报告毛主席圈阅了没有，我说你们问毛主席。当时，毛主席对着我说：“怎么搞的？”意思是说你怎么没把信圈回去。我说：“这样大的事，我不敢圈。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哪一种？”毛主席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还说，这类应景文章，既然已经政治局讨论修改过，我就不看了。当着周总理、黄永胜的面，毛主席让我删去“毛主席和”四个字，恢复过去的提法。

实际上，这个新提法并不是1970年“八一”社论才有的。1969年“两报一刊”二十周年的国庆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写道：“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所向无敌的。”当时中央负责宣传的是张春桥、姚文元。这个新提法，是他们自己所为，还是有人授意？张春桥在讨论1970年的“八一”社论时坚持不改，这又是为什么？陈伯达和张春桥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仅仅是“文字”之争吗？周恩来、汪东兴为什么认为这是需要毛表态的大事？

“一贯提法”的形成

历史表明，这个“一贯提法”，在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上绝不是从来就有的。林彪虽然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代替彭德怀当上国防部长，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但直到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成为接班人和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以前，从来没有人把他同毛泽东并列来讲军队的“缔造”、“领导”和“指挥”的问题。远的不说，就看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

——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纪念建军三十九周年的社论中说：“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和直接领导的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同日，《解放军报》的社论中说：“毛主席亲手缔造了我们这支军队”。

——1966年8月15日（这时林彪已被选为接班人），《解放军报》在《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的社论中仍然说：“由毛主席缔造和培养的我人民解放军”。

——1966年11月9日，《解放军报》在《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更高》的社论也说：“我们军队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所不同的，此社论还高度赞扬“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是活学活用

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榜样”。

可见，陈伯达所谓“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不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有。我们来粗略地考察一下这个“一贯提法”形成的轨迹：

——1966年11月13日，徐向前在接见军队院校来京串联革命师生员工大会上讲话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的。自林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军的战斗力空前加强了。

——1966年11月27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各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代表讲话中说：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为什么这样巩固？靠什么呢？靠的就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由林彪同志主持的非常革命化的人民解放军。

——1966年11月29日，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在和叶剑英、陈毅等接见军队造反派时说：我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在林副主席直接领导下……

——1967年2月27日，陈伯达在接见原三司部分代表时说：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直接领导的。

由所引这些话可以看出，到这时还没有形成陈伯达所说的“一贯提法”，我们继续往下看：

——1967年4月10日，《解放军报》在《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的社论中说：“我们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统帅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培育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中说：“人民解放军是您亲手缔造的、林彪同志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

——1967年4月28日，《红旗》杂志在《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的社论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革命军队”。

——1967年5月7日，《人民日报》在《一定要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中说：“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的人民军队”。

——1967年5月29日，《解放军报》在《拿起笔杆紧握枪，为保卫无产阶级政权而斗争》的社论中说：“我军是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副统帅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

到这时，“一贯提法”，可以说已经基本形成，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

——1967年8月25日，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中说：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和林彪同志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1967年9月5日毛主席批示“已阅，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

由此可见，“一贯提法”不但有一个逐渐“完善”和定型的过程，而且还是集体创造。

“一贯提法”与林彪的地位

笔者认为，“一贯提法”关乎毛泽东和林彪同军队的关系。林彪是开国元勋，在十大元帅中，年龄最轻却排序第三，仅次于朱德、彭德怀。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应该说，这个所谓“一贯提法”，是“文革”中吹捧林彪的一种表现。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中和之后，由毛泽东发起了对林彪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吹捧。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八届十一全会公报说：“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开展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对林彪的吹捧掀起了一次又一次高潮。

1966年9月25日，叶剑英在接见艺术院校、团体代表时说：“最近时期，我们党内还有一个很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选定了他自己的第一个接班人。主席选了几十年了，究竟谁来接班？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近四十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主席选定林彪同志这样最亲密的战友为接班人，肯定地说，不但我们文化革命运动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也完全是乐观的。林彪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好。我们确信，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二、三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人），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

1966年10月9日，肖华在空军干部会上讲话说：“林彪同志一贯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地贯彻毛泽东思想，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他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榜样。我们都应当向林彪同志学习。”

1967年1月21日，周恩来在接见部分来京军事院校学生时说：“在十一中全会上，我推荐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

1967年11月21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将《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和通报》稿，送毛泽东审阅。毛删去了“‘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中的“和好学生”四个字。同“好学生”相比，“亲密战友”使人感到有平起平坐的味道。

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的新党章草案，明确地写上了“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要求删去这些话。康生说：“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提到他的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

1969年4月14日，周恩来在“九大”全体会议上发言，说：“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40年前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同年5月14日，他在国务院系统传达“九大”会议精神时，又说了同样的话。（“九一三”事件后，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做了《对我们党在新民

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讲到南昌起义时说：“九大”时我有一句话讲错了，讲林彪是光荣代表，应该朱德是光荣代表，首功是朱德同志，林彪是跟上去的。）

林彪对“一贯提法”的态度

迄今为止，笔者没收集到任何林彪赞同这个“一贯提法”的材料。而且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不少事实看，林彪似乎不大赞成过于突出自己。除了上面谈过的，我们再从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和张云生《毛家湾纪实》等书中选取几个实例：

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叶剑英主持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他说：“最近我发现有什么林彪同志语录，是学生搞的，一个是中学校搞的，另一个是一个什么红卫兵组织搞的，我们就收到两种。另外，我们总政过去也搞了我的一个政治工作语录，我看不要搞。你们看到的时候，请你们代为没收。总政，我是给你们讲了。我这个意见是雷打不动的，你们不要搞。”

1967年6月16日，林彪致信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称：“近一个多月来，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中，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两个口号并提的情况……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客观需要和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盼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今后帮助注意掌握这一点，并希望将我这封信转发到县团级，由他们传达到所有的基层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笔者写过一篇《林彪不让祝他“永远健康”内情》，发表于《党史博览》2004年第10期）

1967年12月13日，林彪致信军委和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再次提出不要宣传他，并“特别提出以下各点，盼同志们严格注意：一、不要在街上和刊物中，宣传‘树立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的口号。二、不要出我的语录和文集。三、戏剧、电影、小说中，不要叙述我的革命历史事迹。四、不要呼喊‘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五、最近各地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要求我题词的很多。鉴于最近一次题词引起了个别地方两派的纠纷，因此，一概不再题词了。六、应大力突出宣传毛主席和党中央，最好宣传不要提到我。在万一需要提到我时，也无论如何不可超过十分之一的比例。这样才能造成宣传的统一性和集中性。以上各点，盼在营以上干部中印发传达，务必落实。”并要求此信“部队发到营以上，地方发到县以上”。

1968年9月9日，林彪晚上出去“转车”，看到北京街头有“纪念林副主席‘八九讲话’发表一周年”一类标语，回来以后下令林办工作人员必须连夜把那些标语撕掉。

1968年10月26日，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最后，我想讲一点，就是整个两年多的工作，主要是毛主席领导的，具体执行主要是中央文革，特别起作用的是江青同志、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而我呢，就是没有做多少事。我也不是故意偷懒，就是身体不好，不能够做多少事情。所以实际情况了解的不多，工作也做得不多。但是我在主观上总是愿意跟着毛主席的。我有一点保留的意见，就是这次党章上把

我的名字写上，我很不安。”笔者认为，林彪这话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很多问题上，林彪几近“不作为”。

根据以上的事实和情况，林彪对所谓“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的形成，似没有参与，没有起什么作用，换句话说，这个提法与林彪没有关系。有的书，认定“这个提法”是林彪“急于取得更高地位和权力”的证据之一，是没有说服力的。

毛泽东：“缔造就不能指挥呀？”

如前所说，毛泽东是曾经批准和认可了所谓“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的。在他批示“很好，照发”和“已阅，照办”的文件中，都有这个“一贯提法”。可是“九大”后，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又表示不赞成这种提法，一再责问：“缔造就不能指挥呀？”

在1971年的南巡中，毛泽东多次谈到这个问题。

8月27日，在武汉，毛主席同刘丰第二次谈话：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

8月31日，在南昌，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谈话：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又说：说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9月3日，在杭州，毛泽东同南萍谈话：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又提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

从这些谈话看：（一）其矛头明显地指向林彪（但说林彪把“缔造”和“指挥”分开，认为“缔造”不能“指挥”，没看到林彪这样说过——其实即便是提出“一贯提法”的人也不会这样想）；（二）毛泽东已不再相信林彪，也不相信他负责的军队，说“军队要整顿”，提出“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我要抓军队了”等等，都是表明这个意思；（三）毛泽东明确提出“‘缔造’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有许多人”，恐怕是为孤立和反对林彪以争取同盟者采取的一种策略。

在这个所谓“一贯提法”问题上，毛泽东在思想上前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和军队在“文革”中的作用以及发展变化有关。毛泽东发动“文革”，需要林彪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支持（所谓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文革”发动、特别是“全面夺权”后，各行各业一片混乱，惟有军队是一支稳定的力量，毛泽东和中央通过“三支两军”以稳定全国。“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一时成为中国最响亮的口号。事物总有两重性。在“文革”发展过程中军队势力急剧膨胀。“九大”选出的21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果把陈伯达

算在内，林彪的势力占了三分之一；在中央委员（170名）和候补中央委

员（109名）中，军人占49%，接近一半；同时当时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也绝大多数是奉命支左的军队干部。当时的中国，“党天下”颇有“军天下”之趋势。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引用苏联说中国是“军事官僚专政”的话，已经表示他对军队势力过分膨胀不满了。无疑，军队势力坐大，这是毛泽东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手造成的，又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因此，设法削弱和翦除林彪的势力，日益成为毛泽东朝思暮想的要务。

周恩来与“缔造”和“指挥”

其实，谈到中国军队的“缔造”、“领导”与“指挥”不提周恩来，不符合历史事实。他是中共领袖中最早掌握武装的人，也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文革”初期有人建议把建军节的日子改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日子，毛泽东不同意，他说，恩来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时间早，局面大。

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虽都为领导暴动失败受到惩办，但毛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周只受到警告，然后又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928年举行的“六大”上，周继续被选为常委，具体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周是中共中央的实际主持者。在和毛的关系上，周作为领导和上级，前后约有八、九年的时间。周领导井冈山时期（包括瑞金时期）的毛，有失误，但也很赏识毛的才干，积极向全党推广毛泽东创造的经验。人们普遍认为，周是中共党内最早认识毛的军事才干的人，在这方面，周对毛来说，可谓“伯乐”。当毛脱颖而出成为中共军队的统帅后，周尽心竭力辅助毛，是毛在军事上的主要助手。谁都不能否认，周恩来是中共军队的主要缔造者、领导者和指挥者之一。

再看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1924年，周恩来就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林彪是黄埔军校四期学员，可以说林是周的学生，他们有师生之谊。林彪走出黄埔军校后，由于能征善战，跃升很快，但在党内和军中的地位同周相比还是十分悬殊。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周向毛推荐林作接班人，并使他成为党的唯一副主席。周居林之下，不卑不亢，尽责尽力，任劳任怨。仅就周和林的关系讲，“缔造”和“指挥”风波中的两种提法，也都是不正确的。

“缔造”和“指挥”的风波，云里雾里，纷纷扬扬，其实质和底蕴，简单地说，即军权问题。夺取政权靠枪杆子，保卫和巩固政权也靠枪杆子——这是中国共产党一再申明和强调的。军权，或者说，军队的指挥权，在中国政治中十分重要，也十分敏感。多少人在这个问题上“跌过跟头”，给在中国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作者简介：阎长贵，山东聊城人，退休前为求是杂志社编审。一九三七年生，一九六一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工作，一九六七年一月调中央办公厅任江青秘书。一九六八年一月被江青诬陷投入监狱，一九七五年开释后发配湖南农场。一九七九年平反，调回红旗杂志社工作，一九九八年退休。主要著作有《阎长贵学术文集》，与人合著的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导读》等。